

# 新时代数字思政的哲学反思

□ 冯 刚 邢 斐

**摘 要:**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应用对思想政治教育教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既要考虑数字技术在技术手段层面的工具理性,又要考虑数字技术服务于人的价值理性;从认识论角度来看,数字技术的介入,将会对主客体的关系问题和思维方式产生影响,需理性看待数字鸿沟问题、数字风险问题和人的异化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需把握“内化”与“外化”的关系问题、话语问题和质量评价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哲学反思有助于对数字思政内蕴的把握,促使人们对数字思政的认识更加科学与理性,进而助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技术;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反思

**作者简介:**冯 刚,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邢 斐,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2 年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思政课的公众形象塑造研究”(22JDSZKZ07)的阶段性成果。

DOI:10.19865/j.cnki.xxdj.2023.19.005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23)19-0021-08

数字化转型是教育转型的重要载体和方向,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进教育数字化”的重要体现。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应用对思想政治教育教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数字化发展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精准化与智慧化。与此同时,也催生出一些新问题,例如数字与人的关系、教育过度依赖数字技术手段、主客体之间产生数字鸿沟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对此,我们需要基于科学的理论依据,以哲学的视角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使人们对数字思政的认识更加科学与理性,助推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

## 一、从本体论视角对数字思政的反思

本体论是探究世界的本源或基质的哲学理论。数字思政是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是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数字技术的最新发展成果具有划时代意义,人工智能虽然具备强大的算力,但也无法完全等同于人脑所独有的自我意识,即便再“智能”,也达不到人类智能的层级。在把握人类智能与人工

智能的关系问题上,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既要考虑数字技术在技术手段层面的工具理性,又要考虑数字技术服务于人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为数字思政实现价值理性提供智力支持,价值理性反过来又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两者辩证地统一于数字思政实践之中。

1. 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人类智能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人类智能是人脑特有的一种功能,是人的生理、心理与行为等多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具有创造性和灵活性。而人工智能是人把人类智能的某些方面赋予机器。与人类智能不同的是,人工智能以机器作为其物质载体,机器是没有生命力的,它无法选择和利用外界的因素以维持自身的存在。但人工智能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它在算力、数据储存和使用寿命方面优于人类智能。“从人工智能自身的逻辑看,虽然在直观上人工智能表现为机器的实体,但其根本上是数据表征世界、算法实现‘认知’、机械完成‘行动’,是高阶的‘自治系统’,具有逻辑上生成意识能力、行为能力的可能性。”<sup>[1]</sup>因此,我们

应辩证地看待二者的关系,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二者的联系表现为,一方面,人类智能是人工智能产生的基础。人类智能是人类所独有的,是以生命为基础的高级理性能力。人体本身构成了人类智能活动的物质载体,人类智能来源于意识,意识是人脑特有的机能和属性,人类的智能活动离不开大脑的运作,人工智能是作为主体的人类所创造出的以体现人类意志的工具。人工智能本身是人类智能活动的结果,可以说没有人类智能就没有人工智能。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的延伸。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智力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智能是依靠人的智力创造出来的技术,是对人的劳动力的延伸与增强。人类仅仅依靠自身劳动力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能力是有限的,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不断利用技术手段来增强劳动力的历史。“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类智能,但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无法完全取代人类智能,因为,人类智能拥有人工智能难以企及的独特创造性、情感性和意向性。”<sup>[12]</sup>总而言之,人工智能实现了人类某些脑力劳动的机器化,在信息处理、加工方面表现出自动化、高速化、海量化和精准化等特点,延长和放大了人脑的功能,使人类的智力获得相应的解放。人类智能是人工智能产生的基础,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的延伸。

2. 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与行为取向,表征着主体与客体之间处理手段与目标的一种关系。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sup>[13](P56)</sup>。数字技术作为非生命物,是不可能产生意识的,更不可能产生生物的意识,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只能模拟思维,却不拥有思维,从这点来看,数字技术只能是工具。

如果说“数字思政”本身就是一种工具理性,那么这种工具理性使“人”成为技术的主人。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预示着工具理性在教育现代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表明数字技术与人的全面发展关联程度越来越高。数字思政所包含的各种关系实质并非来源于数字技术本身,而是来源于真正发明技术并驾驭技术的“人”。因

此,我们可以将数字思政视为人对于外部世界,尤其是技术主动介入后的外部世界的一种能动的工具理性。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工具理性与意识形态相结合,使得工具理性也开始发挥意识形态的某些功能,有滑向意识形态的可能,对此,马尔库塞曾作出“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论断。数字思政是数字技术作为工具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方式,它将教育内容、载体、方法、环境等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数字技术如何发展,它还是人的理性的产物,数字技术是人的工具理性的延伸。

3.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是相对工具理性而言的。价值理性关注、肯定价值,是对纯粹价值信仰的追求,是支配人行动的精神力量。如果说工具理性只关心手段的适用性与有效性,那么价值理性是人自身发展的主体尺度。

数字技术的出现体现着人类改造世界的权力意志,当数字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全面应用时,此时的数字技术不只是一种科学技术手段,而是具有了科技以人为本的价值底色。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对于促进人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它超越了技术本身的工具理性,体现出数字技术的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也有其质的规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理性。价值的生成离不开主客体,但价值理性不在于对客体本质和属性的把握。它恪守人是万物的尺度,它更关注世界万物对于人的意义,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执着于人的发展。“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关注人本身的价值是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所在。”<sup>[14]</sup>主体性视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价值和主体性的肯定。作为独立的人格主体,最本质的根源即人是创造价值的,人在有目的性的各种活动中创造了人的价值。以人本身为主体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存在,并积极为人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提供条件。

第二,它是一种目的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所诉求的合目的性,既是指合乎人的目的,更是指合乎其自身的目的。”<sup>[15]</sup>价值理性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追求行为的合目的性,既强调满

足人的当下需求,又统筹考虑人的发展的长远利益,谋求个体与整体的和谐共生。人本质上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也就意味着人作为手段,只有在以人为目的,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数字思政的价值理性向度作为目的理性不仅表现在其对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价值导向和规约作用,而且体现在数字环境下育人实践的合目的性。

第三,它是一种批判理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源头活水,自带批判基因,它在批判错误思想中揭露事物本质,教育并掌握群众,以“思想的闪电”彻底击中“素朴的人民园地”<sup>[6](P16)</sup>,在批判错误社会思潮中引领社会主流思潮。另一方面,数字时代带来的不仅是技术的变革,更对我们的思维习惯提出了要求——我们要学会批判思维。大数据的精准算法为我们量身定做带有个人偏好的“专属”信息,日积月累,我们的信息库就从原始互联网空间变成了经过大数据精准筛选后为我们私人定制的“信息茧房”,我们遭受着来源于数据逻辑的无形限制与摆布。因此我们应从批判的视角对数据信息作出理性辨识和判断,警惕价值模糊和教育功能弱化的现象,实现对现实中的价值理性的积极而合理的扬弃,做具备独立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的“把控者”。

综上,数字思政的价值理性内含着人的生存意义,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理性,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与批判性,在实践中发挥着不同于工具理性的独特作用。

## 二、从认识论视角对数字思政的反思

人类从认识客体转向认识主客体关系,又转而深入认识主体自身,数字技术的出现体现了人类认识对象的转移。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的出现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成果,数字技术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认识客观事物是人类智力的重要体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扩展了人类智力系统,在这种变化下我们应理性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新问题。

1. 数字时代主客体边界的模糊。主体与客体是用以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一对范畴。主客体具有相对性,离开了客体就无所谓主体,离开了主体也无所谓客体。关于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

问题,无论是“客体论”还是“双主体论”抑或是“学生单一主体论”<sup>[7]</sup>,都有其立论依据,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探讨,但无论哪种理论都承认了主客体关系的存在,这也是数字化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存在的逻辑前提。

数字空间作为一个跨时空的人际交往空间,既打破了传统的主客体之间面对面沟通和互动的模式,也打破了主客体是现实的“人”的限制,最大区别在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主客体互动是“在场”的沟通,而数字空间的人际沟通更多的是通过网络数字化传播,即“不在场”的沟通。这种互动既可以是“人—人”交互,也可以是“人—机”交互,这种在物理身体不在场的情形下发生的主客体互动,打破了以往严格的主客体界定,使得主客体边界模糊,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去中心化。在网络时空中,去中心化是数字网络发展过程中构成的社会化关系形态和内容产生形态,是相对于“中心化”而言的。就数字技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而言,在有众多节点分布的数字网络体系中,主客体地位会因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影响而发生相对转化,呈现出主客体多样性的特征,通过网络构成非线性关系。这种多中心、扁平化的体系结构,称之为“去中心化”。具体来说,一方面,主体与客体在数字网络中具有对象性关系,共同发生作用;另一方面,二者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当主体接收到来自客体传送反馈的信息,并外化为行为,就由主体变为客体;当客体对已接收的信息进行加工内化,并通过网络节点传送到其他客体,其地位就由客体转变成主体。但值得讨论的是,绝对的去中心化,将会削弱主体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客体很难在海量数据中保持理性判断和选择,教育的实效性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去中心化,不是绝对不要中心,而是由网络节点因时、因势选择中心。

二是跨时空性。从共时性来看,网络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中呈现出一种“时空压缩”的现象,主客体间的网际交往可以跨越时空进行。“5G的超高接入速率加之人工智能、场景生成、VR、AR、MR等丰富的数字化技术手段,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态从平面化走向立体化,从静态变为动态,从现实时空趋向超时空的技术性跨越。”<sup>[8]</sup>在此过程中,主体和客体形成一对多、实对虚的关系,这是传统思

想政治教育所不具备的,体现出强烈的互动性。从历时性来看,跨时空性还表现为社会时间的可逆化,在现实社会中,历史发展在总趋势上是以过去——现在——未来为时间轴单向发展的。但“元宇宙时间具有可逆性,可以静止、暂停甚至重新开始,这在现实时间中是做不到的”<sup>[9]</sup>。这种特性使得主体不仅能够形象化地体验感知客体化角色,还可以发挥主体性创造使自身虚拟化为客体,使虚拟化的客体具有主体的观念属性。因此,在这里主客关系从地位上是可转换的,主客体关系呈现出模糊化。

2. 数字时代思维方式的变革。人类对事物和真理的探寻依赖于一定的工具和手段,其中思维方式就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思维方式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是思维主体观念把握世界的认识方式。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改变,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sup>[10](P573-574)</sup>人的思维方式是随着人的实践方式的变化而发展的,所处的时代不同,其思维方式也会不同。数字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在发生转变,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思维方式。

一是数据思维。过去由于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能力受限,在科学分析中,通过样本数据来推断整体数据的总体特征。数字时代,我们可以利用更多的全样数据而不再依赖于采样分析。大数据因其体量巨大,具有高速、巨量的特点,可以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存储和处理,提供了理论上近乎无限的数据存储能力和海量数据并行处理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分析结果。数据量越大越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接近事物原貌的视角。“大数据诉诸对数据的全样本分析来认识世界、获取知识,避免了理论反思与小样本分析的片面性和非代表性弊端。”<sup>[11]</sup>从小数据到大数据,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仅给人类带来了技术工具的进步,也给人类带来了思维方式上的认识论转向。

二是效率思维。从哲学的角度看,效率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前提性概念,是相对于人的活动而言的,是人的活动的量的规定性。人的思想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捕捉人的思想动态方面显得捉襟见肘。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

用,人们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借助数字技术人们可以快速地对海量信息进行数据采集和检索分析,不断推动数据要素流动。在强大的算法支持下,剔除无效数据,快速筛选出自己想要的数,找出数据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极大地提高了深度释放和挖掘数据价值的效率。“大数据加持下的精准思政可以依据多模态、多场域、多空间的基础数据、相关数据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行为轨迹、精神需求进行精准识别。”<sup>[12]</sup>数字技术与5G、IoT、AI等新技术进行深度融合,不仅提升了大数据赋能效率,而且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效率。

三是时空思维。时空是人们认识社会事实的基本框架,“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sup>[13](P56-57)</sup>。元宇宙是人类运用数字技术构建出来的可与实现世界交互的虚拟世界,是一种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在传统物理空间中,时空依赖于物质和运动。而元宇宙的空间是比特和信息的世界,是非真实世界,即虚拟时空。虚拟时空是主体性时空,反映的是事件或交往关系顺序,而非客观事物的物理运动顺序。数字条件下我们如何认识时空,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时空思维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时空思维方法是主体以时空为中介来把握客体的思维方法,根据主体与时空结合方式的不同,可以把时空思维分为纵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立体思维。总之,数字时代拓展了时空边界,我们既要有横向融通、纵向贯通的思维,也要有统筹兼顾、全盘考量的立体思维,在时空思维中全面反映和把握客观现实。

3. 正确认识数字思政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经过近40年的发展,形成了丰富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是做“人”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根本落脚点也在于依靠人、为了人、服务人。在数字技术未充分发展之前,人的主体性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人与数字”之间产生的问题逐渐凸显,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既不能遮掩回避、视而不见,也不能惊慌失措、乱了阵脚,我们应理性对待。

一是数字鸿沟问题。数字鸿沟,是描述在数字化进程中,人们接入和使用信息技术不平等的概念,“不平等”体现在年龄、性别、地区、受教育水平

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数字技术既为信息共享提供了可能空间,也因主客体的差异性造成了不平等。数字时代下全球性的知识库正在加速形成,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与途径多种多样,不限于教师、更不限于课本,以往课堂上那种定期的特殊供给变得微不足道,满腹经纶、作为知识代言人的教师的权威受到挑战”<sup>[14]</sup>,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中心地位。如果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中存在着教师与学生的信息不对称,那么数字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则会出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数字化系统如何将信息呈现给人,以及如何理解人的意图。这是数字化转型中对于数字化系统与人进行交互提出的新需求。这种人机交互也是数字孪生最重要的技术之一。对此,通过数字孪生新架构设计,架起了物理世界、虚拟世界、人类认知世界的桥梁,以此来解决数字化系统与人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该范式综合考虑了认知要素程度的评估、分类、分级,将人类全要素认知世界引入数字孪生新架构。人类以一种数据化的形式在网络空间中进行交换,社会关系从具体的身体关系转变为数字化的交换关系,从而帮助人与数字之间进行更好的交互,弥合数字鸿沟。

二是数字风险问题。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放大了安全风险。面对数字时代带来的安全风险,既要加强社会伦理建设,将人的数字素养建立在较高的思想道德水平之上,更要加强法治建设,通过法律制度来保障和防范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人工智能在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和学习过程中,个人的隐私数据就有可能被抓取,甚至存在泄露的风险,尽管现有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此类问题发生,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对此,首先应科学布局构建数据管理信息系统,形成覆盖教育教学全过程的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其次,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框架下,在数据安全规范、数据安全评估、监测预警与处置等方面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形成规范统一、互联互通、安全可控的数据体系;再次,“强化对技术主体的价值理性引导和责任意识培育,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和相关学科知识培训,增强专业性,强化算法研发和设计的道德自律性”<sup>[15]</sup>。总之,我们既要顺应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把技术进步与教育现代化相结合,又要防范数

字技术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确保其始终服务于增进人类福祉和科技向善的初心。

三是人的异化问题。“异化”一词最初是被用来表示商品或权利的转让、过渡。在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它被用来说明主客体的一种特殊关系,上升为哲学概念。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同异化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sup>[16](P157)</sup>。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数字技术是由人发明并服务于人的产物,具有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潜力。但数字技术是把双刃剑,我们如果过分依赖或过度使用数字技术,就会遭受因过度饱和的网络信息与错综复杂的线上关系而带来的冲击,产生数字依赖、网络成瘾、数字焦虑等问题。人被动地卷入数字技术之中,成为技术的附庸,渐渐丧失对它的控制,这时人被物化了,出现人的异化现象,与最初的数字技术服务于人的初衷背道而驰。这种异化,实质上就是技术与人和社会的对立,技术成为与人对立的它者。对此我们应理性认识到,数字技术不是对人类劳动的完全替代,要防止数字技术的无序扩张。

### 三、从方法论视角对数字思政的反思

方法论既是学科发展的基石,也是学科发展的必要组成。就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而言,既是理论,也是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离不开方法论的变革。某种意义上讲,通过对数字思政方法论的反思、批判乃至质疑,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把握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实践向度,而且能提高对学科自身学术理性的自觉与自信,在反思中更好促进学科的学理建构。

1.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与“外化”。内化与外化是揭示人的思想行为变化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重要范畴。数字技术的兴起使得数字技术作为工具介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云课堂、VR虚拟仿真、电子教材、慕课等数字化教育场景正在潜移默

化地改变着教育模式。人机互动模式下,内化与外化的过程相应地与数字技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以技术为主要形式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向融入。

一是就“内化”而言,“思想政治工作过程的内在结构是以‘内化’阶段为逻辑起点的”<sup>[17]</sup>。在此阶段,数字技术的介入使得先前人与对象的互动变成人通过技术与对象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又被人观念地理解为自己对对象的直接互动,数字技术作为工具中介的存在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消失。此时我们通过数字技术获取知识、认识世界,但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数字技术本身的存在,这种人机圆融表明即使在技术工具作为媒介介入的过程中,人的注意力也主要是关注对象,技术工具的存在被人所忽视,呈现出“退场”状态。此时,数字技术被人的认识系统所“内化”,嵌入到人的活动之中,成为我们摄取知识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内化”使得人被技术“内嵌”,并逐渐成为“技术化的身体”,这不仅意味着数字技术对人的生活的控制,还意味着技术和知识已经内化了,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有可能出现身体的有机空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改变的情况。因此,在内化阶段,我们既要警惕技术反噬人类的危险,也要避免产生自我认同障碍。

二是就“外化”而言,数字技术的“外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自主意识的外化,而是对人的功能的外化。以人工智能为例,人工智能依靠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将获取的数据和信息通过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等形式外化出来,这种外化已触及人类较深层次的创造性,并将这种能力外化为一种数字化功能。大数据及算法是数字技术外化的底层逻辑,人工智能通过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模仿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通过大量的数据和计算来实现各种复杂的任务,是人类巨大创造力的体现,是人的智力的外化,标志着人类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总而言之,数字时代的内化与外化问题,突破了单一的人与人的关系,数字技术与人类关系、道德和伦理问题、自主性和意识等问题进入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and 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和机遇。

2. 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向。话语问题既是

一个语言学 and 传播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话语可以视作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言说者和听说者之间通过语言符号系统进行思想或精神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sup>[18]</sup>任何时代的话语建构,都包含着时代的特征,表征社会心理,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范畴和话语体系是不同的。时代的变迁意味着固有的话语方式被新的话语方式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话语转向。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对社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也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话语范式,展现出人机融合、叙事方式更加立体的新特征。

一是展现出人机融合的新特征。过去我们对传统媒体下的话语关注更多地在于技术本身如话语框架问题、知识问题、语境问题等。数智融合的大背景下,“实现了‘人一机一人’双向互动的沟通交流模式”<sup>[19]</sup>,也进一步引发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大讨论。通过人机交互,人的意图准确实时地传递给机器,机器将接收到的信息以形式化计算机语言、自然语言理解与处理,以及图形图像识别等方式准确、快速地反馈给人,满足人的需要,使人和机器能够高效自然地协同完成任务。这就使话语呈现出人机协同、群智开放的新特征。总的来说,人机融合是“人”的自由意志与“机”的数字逻辑的融合,是人类语言与数字语言的交汇。人类可以自由地选择使用机器来增强自身的能力,但也需要明确意识到人机融合所带来的话语挑战和风险,并制定相应的语言规则来平衡人和机器的话语转化,使人和机器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达到更好的人机协同效果。

二是叙事方式更加立体。简单来说,叙事即叙述事件,讲故事。叙事不是以满足讲述者自己叙述的欲望为目的,而是为了把事件传达给他人,起到传播的作用。“传统的‘宏观叙事’和‘大道理’的灌输式教育方式和表达方法,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的思想教育需要。”<sup>[20]</sup>数字时代的叙事方式已经超出了以人为主体的传统叙事方式,其结构形式和呈现方式突破传统文本叙事的界限。数字技术的特性决定了数字叙事具有程序性、交互性、空间性等特点,计算机按照规则生成行为,对人的输入指令作出反应,同时数字叙事的对象也能够参与叙事的创作,兼具了叙述者的功能和权威。随着VR、全息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加入,数字叙述的时空特

征创造出了广阔的赛博空间。与文字依靠人的抽象思维逻辑不同,赛博空间诉诸人的视觉和触觉感官,它的强大表征能力使对象进入三维模拟的故事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立体感,实现了叙事方式从平面化的单一文本呈现到立体化的三维呈现的转向,为话语表达提供了立体的模拟场景和时空场域。

3. 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的理性审思。评价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最直接表征,“是监测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检验和提升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sup>[21]</sup>。当前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数字化正对高等教育管理的方方面面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数字化转型既给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也为质量评价提升带来了新的契机。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从功能上来看,经历了由工具性导向到目的性导向的发展过程;从方法上来看,经历了由单一评价到数字赋能的发展过程。

一是从功能上来看,经历了由工具性到目的性的发展过程。工具性与目的性是从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的功能角度区分两种不同价值形态。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中,我们更强调的是质量评价在衡量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中的“标尺”作用,把质量评价作为测量工具,从需求、供给、管理等具有工具性的价值维度来架构质量评价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中,质量评价与数字技术手段相结合,我们通过覆盖学习生活全过程的大数据采集,制定精准的教育改进方案,满足学生的多样化成长需求。数字化质量评价采取的是一种向优求变的追求实效的目的导向,评价的方式方法更加多元,评价的结果分析也更加客观和理性,更加关注评价对象的主体价值。数字技术支持下,评价者各方不再充当权威角色,而是参与到被评价者的现实学习生活中,打破评价双方的隔离状态,双方处于合作性的在场状态,从而为评价者提供跟踪式的反馈信息。

二是从方法上来看,经历了由单一评价到数字赋能的发展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评价指标体系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为提升和检验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美中不足的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质

量评价的评价主体、评价方式和评价功能都稍显单一。从评价主体来看,质量评价主体主要集中在管理者和教育者,学生自评处于弱势状态,第三方教育评价和用人单位评价机制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从评价方式来看,质量评价往往只是一个简单的测量,甚至直接以测量替代评价。这种单一化的评价往往过多关注结果性评价,表象化呈现、手工化操作居多。《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指明了方向。基于“学情图谱”,数字时代的评价实现了从图表结合到图谱结合的可视化,“将评价要素相关数据制成数据图像,主要以图形图像来显示多维非空间数据的关联关系,用形象直观的几何图像技术来反映数据挖掘的过程”<sup>[22]</sup>,全面掌握学生的学情状况。基于“思想动态性”,强化过程性评价。人的思想道德评价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人的思想道德发展本身也是动态变化的,单一静态的评价方式很难真实全面地反映工作质量。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第三方机构的评价系统,可以实时捕捉学生在学前一学中一学后的各类数据,基于学生日常行为数据生成“数据画像”,这不仅可以实时动态反映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预判未来发展趋势,实现了过程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相统一。

#### 参考文献:

- [1] 涂良川,乔良.人工智能“高阶自动化”的主体可能性——兼论人工智能奇点论的存在论追问[J].现代哲学,2021,(6).
- [2] 高华,陈红兵.论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差异[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2).
- [3] [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4] 魏永强,郑大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分析[J].求实,2014,(9).
- [5] 项久雨.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7(6).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7] 刘书林,高永.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及其主客体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1).
- [8] 徐稳,葛世林.数字化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

- 的三维探析[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 (3).
- [9] 严兆星, 薛晓源. 元宇宙: 时间观念的革命[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 (6).
- [10][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 [11] 闫坤如. 数据主义的哲学反思[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1, (4).
- [12] 罗红杰. 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 前提认知·结构革新·实践策略[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 (12).
- [14] 张磊, 徐继存. 数字化时代教学变革的问题与思考[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2(2).
- [15] 米华全. 智能思政伦理风险的生成逻辑、表现形式及防控机制[J]. 中国电化教育, 2023, (2).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7] 唐登莹, 吴满意.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化的价值、逻辑与改进[J]. 思想教育研究, 2018, (8).
- [18] 何志敏, 刘畅. 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探析[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 (8).
- [19] 冯刚, 龙波宇. 大学生网络话语的文化分析[J]. 思想理论教育, 2018, (6).
- [20] 徐稳, 葛世林. 数字化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三维探析[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 (3).
- [21] 冯刚, 史宏月. 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评价科学化[J]. 教育研究, 2021, 42(10).
- [22] 王莎.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数字化变革[J]. 思想理论教育, 2021, (12).

责任编辑 马程

(上接第7页)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不断增强广大师生的获得感、幸福感。要教育引导干部师生对标教育强国建设, 既胸怀“国之大者”, 树立“担大任、创大业、干大事”的大格局, 从大局全局高度看问题、想事情、谋良策, 又心系“校之要者”, 将个人工作置于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来布局, 笃行抓好每一件事情的落实, 致广大而尽精微。要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推动教育教学模式创新、方法载体创新, 实现思政课堂、课程思政和社会大课堂、网络课堂的同频共振、协同育人; 要充分发挥党校教育培养主阵地主渠道作用, 不断完善教育、培训、培养、管理、监督全链条教育管理机制; 要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挖掘红色文化资源, 完善党的创新理论和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机制, 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打造更多受师生喜爱的可视化“红色课堂”; 要落实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实施方案, 全面构筑具有校本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 加强师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推进“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 完善“三全育人”工作格局; 要聚焦让学生享有更好的教育, 建设一流本科人才培养体系、卓越研究生教育体系, 全面修订落实最新版本的科技人才培养方案, 推动本研贯通一体化; 要持续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丰富发

展学校精神内涵, 传承弘扬学校优秀文化传统, 积极培育艰苦奋斗、乐于坚守、敢于创新、争创一流的大学文化。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不断提高组织工作质量[N]. 人民日报, 2023-06-30(1).
- [2]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6-12-09(1).
- [3]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4] 中共中央宣传部, 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3.
- [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责任编辑 杨晓红